

中文版序

我很榮幸，這部香港建城歷史著作能夠以中文面世，這也是我的長久心願。

回望2020年3月——全球疫情爆發之初，我受邀為朱濤和朱逸蕾的中文博客「空間行動」(SpaceAction)寫一篇短文，文章濃縮了我早前的研究，探討瘧疾與1840年代香港最初城市發展之間的關係。該文由逸蕾精彩譯成，題為〈形式追隨熱病：一場翻轉香港城市格局的瘧疾〉。正如副標題所示，瘧疾一定程度上對香港早期城市景觀所造成的劇烈空間轉變，在我們這些建築師——我與朱濤以及逸蕾之間，產生了強烈共鳴。但彼時我們尚未經歷2019年新冠疫情施加於我們的長期隔離，以及更多的社會與心理衝擊，也未曾預見伴隨而來的政治變化。隨著時日過去，我所書寫的那段歷史，其心理層面亦開始擁有了更深刻、更廣泛的意涵。比起一系列事件，我逐漸對其中主角的看法更感興趣；也可以說，透過不同看法的棱鏡，事件會顯得更為有趣。萬萬沒想到，我這篇短文在此後數週內，在中文學術讀者群內能引起如此反響，也是在朱濤的推動下，我於當年夏季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提交了書稿提案。本書將會發佈中文版，是我選擇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接下來，正如那句諺語所言：此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the rest is history)。

我與香港的淵源始於它神秘的名字。小時候，我在倫敦郊區長大，許多兒時的塑料玩具印有「香港製造」字樣，印象最深的是我五歲生日時收到一套珍貴的塑料小恐龍。這個名字喚起了我的玩樂時光和歡愉。香港，英國電視台也曾把它作為某個即將被「移交」的地方來討論，因此在我最終生活於此之前，這個地方早已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成長之時，我想像過是否可能親眼目睹「九七回歸」，而這真的發生了。1996年春節，我搭乘幾乎空無一人的國泰航空前往香港，作為一名學生建築師參與新機場鐵路系統的工作。1997年7月1日午夜剛過，我跑步經過灣仔，登上一座俯瞰海港的小小行人天橋。我站在一位肩上扛著小男孩的父親旁，目送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靜靜駛向鯉魚門海峽。在會展中心的一切盛典過後，現場幾乎一片寂靜，唯有一艘小拖船隨遊艇而行，向維港噴灑海水，濺起微微聲響。「好吧，就是這樣！」我邊對自己說，邊走回西營盤的家，心想：這就是「帝國終結」的感覺嗎？一捆捆清晨新聞報紙已從破舊卡車上卸下，汗流浹背的工人揮舞著鐵鉤。日常生活似乎絲毫未受影響。然而，中國已悄然接管了這片領土，而我作為英國人在殖民時期香港所享有的優越身份，也驟然轉變為身處「中華之國」特別行政區的一名外國人。這座城市的空間未有改變；而觀念變了，行政管理、政策變了，這都是實實在在的。回首過往，我意識到我日後的大半學術生涯皆與這個關鍵時刻有關。我時常思索，無形之事是如何造就有形之物。本書只是我這個畢生思索的一部分：在這裏，是關於一場神秘熱病如何促成一座城市的形態。

經過多番擴寫、編輯、再修訂，並搜羅及整合新的文本與視覺檔案資料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去年、2024年3月推出了本書英文版。過去一年，驚喜不斷，令人既感謙卑又錯愕。我很榮幸受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於2024年7月香港書展上就本書發表演講，同時在中文大學出版社余敏聰以及何靖淇的幫助下，參與了多場新書講座和報告。去年10月，本

書於倫敦建築聯盟學院進行了在英國的發佈會，同月稍後我亦在保羅·梅隆中心發表演說，講述書中所收錄的地圖與繪畫。新近的驚喜是，這本書廣受歡迎，尤其獲得美國讀者青睞，因此它已進入二次印刷。在最近的3月，美國出版業協會將本書列入PROSE Awards「世界歷史」類別的決選名單，表明此書已吸引到規模可觀、反應熱烈且多元的讀者。

至此，事情輾轉又回到原點。朱逸蕾從2024年秋季開始投入本書艱巨的翻譯工作。將本篇序言譯成中文會是最後任務。我想感謝她和朱濤為本書中文版所傾注的卓越努力與善意幫助，亦要多謝余敏聰一直以來出色而不懈的編輯工作。我很高興此書終於能分享予中文讀者，並期待著它會引發怎樣的迴響。惟望您能感受到這段香港早期歷史故事的迷人，儘管它既古怪，又有奇妙的當下性。

寇維 (Christopher Cowell)

2025年5月

於倫敦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序言

本書的寫成，伴隨著兩場悲劇的印記。第二場悲劇指我們近年這次全球疫情，它重新激發我對第一場悲劇的書寫——即19世紀中葉的致命疫病及其對香港島殖民化的影響。那場疫症永遠改變了一座新興城市。當我開始重新審閱這一專題研究時，正值2019冠疫情初期——這是1918西班牙流感以來首次全球大流行病。在漫長封控中，從東半球到西半球，我們對當地社會和空間的感知變得破碎、原子化，暴露出社區構建的脆弱性。來自遙遠呼應，香港島北岸的城市起步，同樣是碎片化且封閉的。香港社會在變數下匆匆形成，它經歷了重重危機，先是政治和經濟動蕩，不久又遭遇疫病。這是一場生命逝去、機遇流失的悲劇。然而，經過1840年代的成形、中斷、再重塑，這座城市的肌肉記憶鍛煉出一種形態上的韌性，其中可追溯它實體空間發展的頑強表現，包括持續不斷的填海造地、建築的氣候調節，以及垂直建造。民眾不斷進化的疾病認知，以及如何認識疾病與天然地形或人為地形的關係，亦是整個變遷的基礎。

本研究是關於香港社會及其城市化起源的首部深度歷史記述。對於歷史學者而言，很難得能夠剖析一座城市的形成過程並理清其構成要素。不過，香港的情況也十分特殊，其存在根基保持著人為的不確定性。十多年前，在我就讀於香港大學歷史系、寫下本書核心內容之時，初衷是揭示並

解釋殖民者推動香港島早期建設的動機和政治考量。出乎所料，最能將這些資料串聯成歷史脈絡的，竟是一場疫病爆發——一波波始於1841年夏天、到1843年達峰的瘧疾侵襲。結果發現，要解讀這座新興城市的建築與城市格局，最深刻的方式莫過於一種具體呈現——記錄定居者在建設過程中，因疾病帶來生命危機而產生的恐懼與機遇。1840年代前半期，香港島因疾病肆虐和致命環境而聲名狼藉。於島上生活的疑懼與危險，均反映在當時的視覺及文本資料中，這兩類資料會在本書交叉運用。這場疾病還突顯了殖民統治下殘酷的種族與階級政治，加深了精心籌劃的土地奪取所造成的特權格局，從而使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受損，其他群體獲益。意象，從來不是無辜的。本研究強調香港的「建構」，必然既是實體建成的、也是人們想像當中的，它隨時間而變化。因此，我的研究逐漸演變成一部景觀史，探索早期殖民者如何重新評估香港島北岸的地形、地質、社會以及早期城市定居點的建設，他們迫切地試圖找到致命疾病的本質及原因。這一人人受災的疾病被稱作「瘧疾」，意為「壞空氣」，被認為是土地散發的氣體。由於瘧疾被視作來自低窪地區的氣體，它很快迫使這座年輕城市以「剖面」思維發展，形成一個人們生活在不同高度及空氣環境的分裂社會。因此，「疾病」為殖民地的城市空間及劃分增添了關鍵的第三維度（海拔）。歸根結底，城市流行病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政治機遇、分化和社會變革的歷史。問題在於，這種權力由誰掌握？

本書的研究與寫作得到許多朋友、同事和機構的幫助和慷慨建議，如有遺漏，謹此致歉。我首先要感謝管沛德博士 (Peter Cunich)。十五年前我進入香港大學時，他擔任歷史系主任。當時我已是建築系設計導師，於我而言，轉向歷史學是惶恐之事，但幸得管沛德悉心指導。他不僅是我的指導教授，更成為我的良師、益友。感謝他對我的耐心、方法論上的用心培訓、對歷史學的熱情，以及對學生的關懷體恤。管沛德的方法深刻塑

造了我作為歷史學者的早期訓練。傑出的香港歷史學家高馬可教授 (John Carroll) 彼時剛加入本系。他無數次向我分享其豐富經驗和詳盡建議，從檔案研究方法到寫作，再到延展的研究領域。我享受我們之間的諸多熱烈討論。他慷慨地逐章審閱了本書原稿初版。在我研究初期，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現併入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的冼玉儀博士熱心分享了她的早期中國文化研究，特別是香港島石匠工藝在前殖民時期的模糊歷史。其深刻見解讓我了解到，此地早已存在比較博大精深的建築勞工及承包文化，這是英國人所利用的、而非其創造的。在撰寫書稿期間，我有幸與香港著名地圖經銷商喬納森·瓦提斯 (Jonathan Wattis) 進行多次愉快交談。他對香港歷史的無限熱情和想像力，以及他關於本地區畫作、圖像及地圖的專業知識，一直在挑戰、激勵並啟發著我的闡釋。美國莊鶴堅斯大學醫學史研究所的格雷厄姆·穆尼博士 (Graham Mooney) 熱心與我共享了城市化相關的瘡疾與醫學專業文獻。我希望這能夯實本書，也拓寬了我對該專業領域研究脈絡的理解。

儘管我後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研究重點已轉向印度，但香港歷史不時會再次湧來。最關鍵的一次，是悉尼賀登書屋 (Hordern House) 創始人、世界領先的古籍經銷商之一迪利克·麥當奴 (Derek McDonnell) 給我一封意外來信。不巧，在他聯繫時，我正從悉尼一個學術會議返回紐約，所以未能相見。近年，建築師愛德華·阿什沃斯 (Edward Ashworth) 失傳已久的水彩畫藏品在澳洲重現。賀登書屋買下了這批畫作，於是迪利克尋求標明畫作歸屬，並請求幫助確認每幅畫作的創作時間、畫家背景及其與阿什沃斯行蹤的關聯。事實證明，阿什沃斯這位四處漂泊的英國建築師，在殖民城市歷史中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不僅在香港早期的維多利亞城，還有奧克蘭和悉尼。他為香港島新興的建築行業提供了罕見線索，也是香港城市發展的關鍵闡述者。如此，我對香港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進入

了第二階段，更側重於建築和視覺場景方面的研究。我於2014年底完成這套畫作圖錄，也很欣喜香港藝術館購買了藏品中的香港部分。本書因囊括這部分作品而獲益匪淺，它們從未在圖錄之外發表過，也未曾在恰當的歷史背景下與其他視覺資料進行比照。我要感謝迪利克，因為他再次喚回我對早期香港的探究，並開闢了更多視角，讓本書受益。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以及歷史學之路的同道。戴夫·麥卡里 (Dave Macri) 當時在歷史系完成博士學位，他對細節的一絲不苟和對研究的縝密剖析方法啟發了我，這些都在他不斷拓展的知識寶庫中。我有幸能和建築史學者朱慰先、曾若暉及羅坤 (Cole Roskam) 分享經驗與見解，他們彼時分別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學任教，恰巧在我最需要支持、正逐步熟悉各大檔案館時齊聚倫敦。他們或許無意中為我的二級文獻研究種下了跨學科種子。我還要特別提到兩位好友袁賜弟和謝嘉聰，他們對香港消逝中的建築遺產懷有同樣熱忱。我們曾一起投入很多時間，從不同角度思考香港歷史。在香港大學建築系，我要感謝朱濤和成美芬，他們對我的延伸研究提供了許多有益建議。朱濤成了我的諮詢對象，幫我構建宏觀思路，並提供了批判性和理論性洞見。如果沒有朱濤和他的助手朱逸蕾在2020年聯繫我、為其平台「空間行動」貢獻一篇關於香港疾病及城市化的文章，本書也許不會問世。與此同時，作為這不幸時代的一部分，我受聯合編輯陳昱宏之邀，於當年晚些時候為《香港建築師學報》(*HKIA Journal*) 撰寫了一篇關於瘧疾與早期香港的文章節略版，進一步顯示讀者對此書的可能興趣。

我還要感謝幾家檔案館及其工作人員的慷慨助力。尤其是香港特區政府歷史檔案館，儘管資料零散，其員工的周到與細心讓我在查閱歷史圖繪資料時深感受益。最幸運是發現了歌連臣家書，以及施其樂收藏的卡片檔案中寶貴的參考資料。同在香港，香港大學的特藏部已成為我長達數月的

夜間研究基地。馬禮遜特藏所的19世紀中葉報紙和圖書館大量的微縮膠捲片及微縮平片收藏尤為珍貴。而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對查閱各種稀有的19世紀出版物至關重要，特別是旅行日記和期刊，包括《皇家工兵專業論文集》。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圖書館及其工作人員協助我查閱了當時的專業建築期刊，如《建築師》、愛德華·阿什沃斯關於中國建築的辭典條目，以及該學科當時其他有價值的評論。在國家海事博物館(位於倫敦格林威治區)的凱爾德圖書館及檔案館，工作人員協助我研究各類海軍資料，特別是外科醫生愛德華·克李(Edward Cree)那卓越的插畫日記。我常流連於邱區的國家檔案館，研究「CO 129」檔案(殖民地部所設的香港永久代碼)及軍部的視覺資料。這座資料庫廣博且關鍵，它幾乎涵蓋了香港與英國之間所有的政府往來通訊，包括報告、備忘錄、條例、立法以及各類地圖、規劃和圖紙，其中許多相同檔案在二戰期間、香港被侵佔時已遭損毀。在倫敦之外，我必須要感謝皇家工程師學會允許我在位於肯特郡查塔姆鎮、毗鄰其博物館及軍營的圖書館停留幾天，這是專為我開放的。該圖書館提供了大量關於其建設成果的已出版及未出版資料。我還要感謝倫敦的馬地臣公司，允許我查閱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與大學檔案部中龐大的怡和洋行檔案，這些資料揭示了怡和洋行作為島上最重要的單一投資者對殖民化的野心與恐懼。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我要感謝以下機構及個人，允許我使用他們各類視覺資料：英國國家檔案館(倫敦邱區)、香港藝術館、國家海事博物館的凱爾德圖書館和檔案館(倫敦格林威治區)、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美國馬薩諸塞州賽勒姆)、香港歷史檔案館、大英圖書館(倫敦)、紐西蘭國家圖書館的亞歷山大·特恩布爾圖書館(紐西蘭惠靈頓)、耶魯大學英國藝術中心(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哈佛大學貝克圖書館特別館藏與檔案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衛爾康藏館(倫敦)；思源堂的何安達先生(Anthony

Hardy) (香港)；卡素美術公司的理查德·卡素先生 (Richard Castle) (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英國海道測量局檔案館 (薩默塞特郡湯頓)、維多利亞與亞厘畢博物館 (倫敦)，以及史丹福大學的巴里·勞倫斯·魯德曼地圖館藏 (加利福尼亞州史丹福)。

我認識到，本書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作品中有一定開創性，因它新近引入了亞洲殖民建築與城市歷史，作為新領域、拓展了出版社長期努力的藝術與建築研究。我熱切與他們接洽，因為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有同時出版中英文作品的特殊使命，我希望這本書能超越英語世界，觸及更廣泛讀者。因此，我要感謝出版社為實現這個計劃所作出的不懈奉獻與用心。感謝甘琦社長、編輯部葉敏磊主任，我很高興兩位立即意識到這份研究的價值，在長時間的同儕互評中始終保有信任與熱情。在本書編寫後期，我非常感謝位於愛丁堡的索伊·羅斯 (Zoe Ross)，她是我的索引編輯，感謝她的細緻工作，也謝謝她在緊迫時間內竭力完成了任務。但我尤為感謝我的編輯余敏聰，他在製作過程的各個階段敏銳且耐心地給予我支持與協助。我需要向他和他的出版社同事致歉，我因兼顧教學任務和跨國搬遷造成了多次拖延。但結果不言自明，這是一部超越預期的作品。這本書得到了保羅·梅隆英國藝術研究中心的出版贊助，以及第二筆來自都柏林三一學院協會與信託基金的慷慨資助。我感到欣喜又寬慰，這段迄今被忽視、但卻奇特又迷人的香港早期殖民史，如今終於能在英語和中文世界中被閱讀、琢磨、討論和想像，並展現出它那迅猛而原始的戲劇性，在此希望它能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現代香港。

寇維

2023年12月

於倫敦

譯者說明

翻譯本書於我而言恰如一場「輪迴」。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之時，頗具媒體敏感度的朱濤教授策劃了以「疾病與空間之關係」為主題的系列文章，而由本人精編的〈形式追隨熱病：一場翻轉香港城市格局的瘧疾〉即是其中之一。文中內容節選自作者寇維在2013年發表於《現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的中長篇論文“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猶記得當年在疫症隔離期間翻譯該文，瘟疫肆虐，深覺我們都是身處其中的個體。

2024年在本書英文版發佈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葉敏磊主任邀請我繼續參與全書翻譯。這當然是本人的榮幸：經過四年，不僅有機會回望疾病對於城市空間和社群的深刻影響，而數年前尚不成熟的短文翻譯，亦終可在此譯本中修正。這裏有必要作幾點說明：

朱濤教授作為譯校，對本書第一章進行了字斟句酌的校對，為後章打下必要基礎。如後章有不妥和差錯，責任自然應由我承擔，敬請讀者賜教。

譯者對個別內容作了補註，在正文下方以「譯註」字樣出現，幫助中文讀者理解。

文中出現的洋涇浜英文（皮欽語），譯者結合歷史背景，譯為帶廣東話口語的文字。

譯文使用了「蠶」字眼，絕非贊同其歧視意味，而是忠實反映相關史料的用法。

最後，感謝原著者寇維在翻譯期間的解答和釋疑，希望譯本能不負他的才思與用意。譯者亦有幸得到朱濤教授及幾位朋友的鼓勵和有益幫助，特此鳴謝。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由於他們的慧眼和魄力，本書才能與大家見面。尤其是編輯余敏聰，他的編輯工作貫穿中英文版始終，其中的緊密協調以及細緻校訂給予了莫大支持。在此再申謝忱。

這部作品押著時代韻腳而來，願能與讀者共鳴。

朱逸蕾

2025年5月

於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